

钟鸣 周南泉 主编

三星探玉

厦门点石斋艺术馆
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 编



厦门点石斋艺术馆
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
编

三星探玉

钟鸣 周南泉 主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星探玉 / 厦门点石斋艺术馆, 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编.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458-0338-9

I. ①三… II. ①厦… ②厦… III. ①巴蜀文化—文化遗址—简介②古玉器—简介—中国 IV. ①K878②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62767号

主 编 钟 鸣
周南泉
编 者 厦门点石斋艺术馆
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

三星探玉

责任编辑 包晨晖
技术编辑 吴 放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印 刷 上海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9.25
书 号 ISBN 978-7-5458-0338-9/k.50
定 价 260.00元

玉在今人，多为附身装饰，好尚雅玩，或作为财资贡人恶劳，而上古三代，除日常功用，玉则多涉礼教，像《周礼》所言：“礼仪以为器”，大，可为正天观象之器，即《尚书·尧典》所载：“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微，可冕服凭玉几，制作剑饰、鸠杖（古人至七十便要授玉杖）。更重要的是各类型玉器，无论制作尺度，还是使用配置，都会述之礼法，像《考工记》“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一类。器物纳入礼教，不过是维护社稷尊卑之分与人的等级品质，于今人是个陌生的领域，就如大家多有不知，今日社区之“区”，其本义就疑与“玉”有关，即“玉十为区”，社众之“社区”是很后来的意思。其中“品”，为祭名，所祭之器，以三为易之大数，品字排列，有人疑为金玉，窃以为玉的可能更大。玉石祭祀之数，相关人事活动的区域，足见玉与礼制空间的关系。所以，孔子在鲁国见宝玉嘱“远而望之”。尽管老子叹“金玉满堂，莫之能守”（《道德经》），但玉之五德，却影响甚远。

有人问玉于圣者，最见这“五德”的伸张。子贡曾问孔子：“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似玉的石头）何也，为玉之寡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诤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所以，《礼记》言：“君子必佩玉”，而且“无故玉不去身”。

从这里不难看出，虽然，玉礼仪中国古代文化典章制度之一粟，但也大有密不透风的感觉。从好的一面看，说明我们的祖先，崇尚自然，一器一物，如天地之阴阳，与生命均有哲学对等的意味，所谓人法天，天法自然，即“人之初，性本善”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大儒辜鸿铭概括的“良民宗教”（《中国人的精神》）。就玉石与人类生存悠久的历史看，玉礼首当其冲。这样的教化，不是发生在现在，而是在三皇五帝的时代，如贾子所言：“黄帝济东海，入江内，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尧教化及雕题蜀越，抚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训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狗国”，再后来，茫茫禹迹，连孔子也只能“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拾前朝遗余而已。难怪后来，西方人多言东方古代礼教过早成熟，甚至早于欧洲，但因为那些“知性”的担纲者，如韦伯



笔者于赤峰夏家店文化遗址考察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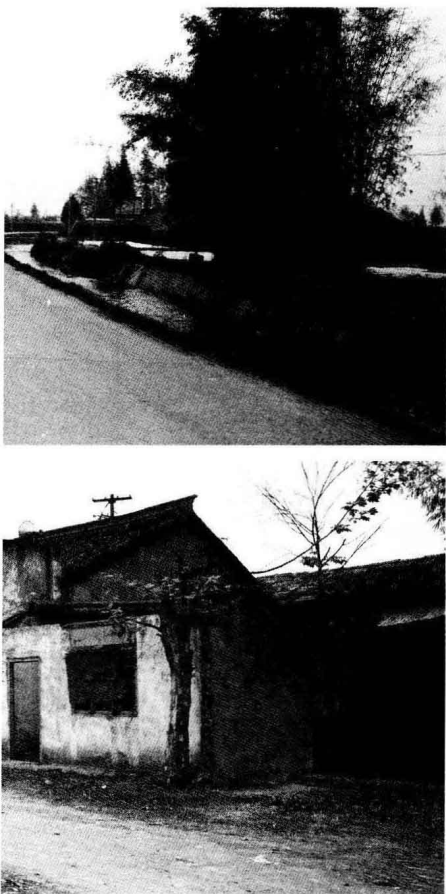
(Max Weber)所言,都为“卡利斯塔”(Charisma)原则所支配(《中国的宗教》),所谓“卡利斯塔”也就是大祭司超自然的品质,而未能有科学、逻辑精神的发展,故难以进步。这大致涉及到玉器文化物极必反的另一面,过于繁琐,过于描述性,——也就是过于直观,过于沉迷,——再因财富观念的兴起,加上巫筮通天、立尸玉祭、列于鬼神的活动,还有服食水玉,求长生不老道家的穿凿附会,玉的传播,便加速成为文化传奇。其中最耐人寻味的,该是和氏璧的故事,古籍多有记载,最早是《韩非子》,刘向《新序》,大同小异,章学诚《骈语雕龙》录《琴操》最洁:

卞和得玉献怀王,王以为欺,刖一足。怀王死,平王立,复献之。王又刖一足。平王死,荆王立。和欲献,恐见害,乃抱璞而哭。荆王使剖之,果得玉,乃封和为零陵侯。和辞而去。

听闻蜀中——岂止蜀中,或可谓举国上下众多藏客,近年也多有献宝于社稷者,刖足谈不上,被弄得灰头土脸是有的,想来都是重演和氏悲剧。而最后,明白过来的秦昭王,毕竟也有用十五座城池换那和氏璧的壮举。其实,玉器作为神馘、财富为社稷认真对待,还应该发生得更早。尧帝就曾在雒河之滨(此雒余疑为蜀地都广之野的雒水,非中原伊洛之洛)拾得绘有天地之形的玉板,周文王也得到过玉板,却被商纣王派胶鬲、费仲索走。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从太昊伏羲氏开始,便画八卦造玉书契。商灭夏,周灭商,不仅有迁九鼎于亳、于洛,而且,也有以数十万计的玉器被移往新的王朝京畿。这些都有典册记载。古代如此大规模的玉器迁徙,不啻引我们对玉的递嬗发生浓厚的兴趣,也忒想摸清古玉礼制与中国历史的脉息,而更该深究器物的来龙去脉,形制的演变,功能的消长,端正谬误,或许侥幸还能冰释国史的难熬之处。就这点而言,纵观现存世玉器,虽囿于陋见,并排除未出土的情况,在我看来,要超过三星堆玉器的完整性及重要性的怕还没有。

据故宫博物院周南泉先生言,清代即有蜀玉入宫。典籍零星记载,秦汉后便有蜀玉出土。就近代而言,三星堆器物乃1929年问世,遂为世人耳熟。民国间即有器物入上层幕僚皮藏。20世纪首展大英博物馆,21世纪初,经比尔·盖茨母亲倪密(Mimi Gates)的斡旋,副总统戈尔、基辛格和小布什(时为州长)的吁请,方首展美





上图：三星堆月亮湾遗址附近的燕家大院。

下图：原三星堆真武村公所所在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附近出土的青铜器都被村民砸烂拿到这里，以几分钱的价格买给收荒匠。

国西雅图，遂又一发不可收拾。海内外在述说它种文化时论及三星堆的也日益增多，特别是美洲的玛雅文化及印第安文化。近翻西人编的《三万年艺术：人类创造穿梭时空的故事》（*30,000 Years of Art: The story of human creativity across time and space*），图录中，中国古物首选入此辑的人像类便是三星堆高达2.6米的青铜立人。

这些都说明三星堆文化类型的特别，如若细致之人，比较他类，自该钦慕之余，扪心自问，如此精美之物，何人，何朝能为？以前，最简单的解释即是小则“夷地”之物，大则“中国”之物。殊不知，连这“夷”或“中国”也必须要有个交代的。因为“中国”的说法，肇始很晚，《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韩非子》“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或统诸侯，或泛指，至少“三星堆文化圈”不在内。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剪灭而趋统一这点很明显：“禹之时，涂山之会，执玉帛而朝者万国，汤之时三千，武王时犹有千八百国”。这个时候，应该就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所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一统观”：“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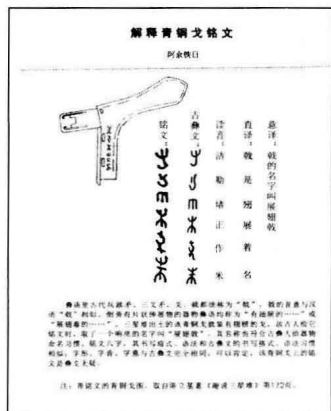
而孔子那时就已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谓“四海之内”，也无非就是“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混合。古人的“夏”也没搞得确切，故只能调和“入夷则夷，入夏则夏”的说法，这种说法的依据其实就是看到所谓的“夏”和四周的“夷”各有各的根源。“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这种同化过程往往是很快的，不过一两代人，而且进来是华，出去就是夷”。李济也早依人类学的证据发现，殷墟人种并非一统，相反差别很大。这些都是质疑“大一统论”的。

正是受“大统一”的影响，所以在一般非约定性论及夏商周时，也很容易把旧石器、新石器、上古扯在一块，一并纳入“中国”的范畴——也就是国家的概念。而严谨的史学家，言及上古，就很担心这个词，许倬云先生便是一例。因为拉丁语的“国家”一词，有主权的意味在里面，很容易和族群、族团混淆，所以，他宁可用“政团”而不轻用国家。四川那段历史，若说先秦时期，巴蜀尚未进入华夏，现在看来，大有问题，与古籍记载不符。尤其当流布民间的玉器，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更完整的华夏文化各种元素时，便让传统的史学和美学不安起来，但族团、方国之治，和其他地区没什么不同，而且，“濮、夷、滇、僰、僚、邛、冉……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超过许多地区，所以，混合及复杂性成为三星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也就不难理解。

不管怎样，在未厘清三星堆文化在上古史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前，先将其纳入“多元”的、或“东方”的是明智的。因为，从许多研究的结果看，在所谓“后新石器时代”，从埃及一直延展到黄河及印度河，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文明，即“彩陶文明”，后来才逐渐形成各自分散、发展与进步的四个伟大的历史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拿早期古文字相比，埃及文、巴比伦文、腓尼基文和中国的文字都有类似的地方。何况三星堆前文字状态，无论载体、还是书写方式的多样性，已明显越过了晚商的甲骨文，更凸显其坐标的意义。但在对待具体的文化板块上，多数人实际上并未秉持此种观念，所以，才有了李济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民国史学者顾实先生，历数年精心疏证《穆天子传》，发现周穆王西行所达“弇山”、“陵羽”竟在欧亚的波斯领地和华沙近郊，此种疆域，不仅能证黄帝教化的广大疆域，也顺带证了西周时昆仑为“天地之中”的地理实况，用训诂的方法，也多有学人训出最早“昆仑”即“岷”，也就是扬雄所谓“岷嶓即乾”。太史公在《史记》里也清楚地叙述了黄帝支系与蜀族的关系。这些典籍中的事实，都未上秦始皇的大当，而叙之别史。

如果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书于竹帛，镂于金石



彝族学者阿余铁日释读战国青铜兵器古文字图例。

从20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在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器物中（包括广汉地区和成都地区），官方的也好，民间的也罢，公之于世的青铜器上似乎都还没发现文字。前些年，彝族学者阿余铁日在郫县出土的一件青铜戈上发现其铭文可用古彝文解读，但从器型看，是春秋战国之物，和1974年郫县独白树出土的另外一件虎纹铜戈相似，都有不可释读的铭文。本土学者将其命名为“巴蜀图语”，在蜀地已出现了很多，让少许学者看到一线曙光。但巴蜀图语毕竟与我所言及的“前文字”还相去甚远。当然，如若通过研究，确定巴蜀图语与已出现的三星堆玉石文字有渊源关系，那就得重新对待了，因为，这些文字迄今也没有进入官方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视域，铜戈铭文也与现在几成定论的“三星堆文化”时间段不合。

三星堆文化的时间，一般设定为上限距今4500年 $\pm$ 150年，延续至距今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传统帝系的夏、商、周。但这个设定，和公布的三个碳十四年代数据有出入，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的年代范围应在公元前2873 - 2340年间，也就相当于龙山文化前期。上古文化艺术馆收藏的一件三星堆琬圭（或舌形器），上面浮雕的神人兽面纹与龙山文化出土的圭接近，形态可能更早，是比较直接的证明。还有，在广汉发现有大量石器，在什邡（古为汁方，属广汉郡，为三星堆文化区域）发现有与大溪文化、小河沿文化相同类型的人面玉饰件，或与台湾卑南文化类似的单人或双人顶虎、龙玉饰，这些都是可直抵距今5000年的文化形态。而据常识或官方数据，都足以说明，三星堆文化上限时间比夏朝（公元前2070年）早700余年并非妄说，与常璩《华阳国志》所谓“历夏商周”也更贴近，与苏秉琦先生关于“成都有五千年文化根基”的推断相吻合。

另外，大家由不同路径言及“文化”，牵涉最重要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假设，上述青铜器铭文，与已发现的三星堆玉石器文字能够搭上边，那么，三星堆文化时间的上下限，就有可能上溯后推。而且，已有两个条件让人觉得似乎有这种可能：其一，西安半坡刻符、甘肃大地湾遗址彩绘符号、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龟甲刻符和柄形石饰刻、划符号，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刻划符号，甚至山东的丁公陶文，已被多位彝学学者破解，疑与古彝文同

源；其二，北大语言研究中心一个关于藏缅语系的课题，已确知彝语和汉语越古越同源。

所以，我们就更有理由关注巴蜀图语之前的古蜀文字。地下材料的大量出现，也提出了这种紧迫性。三星堆玉石器文字，见诸估客藏家，当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专家”否定，遂缄口不敢言及。虽有一二藏家注意到文字问题，但仍未脱中原先决论的窠臼。至2005年余介入玉石收藏，见契文大惊，遂倡导解决的根本之道。近年，各项工程覆盖广汉，尤其城际列车轨道铺设，略城池而过，地产直抵保护核心区，促使各种器物及文字载体纷呈，包括龟、蚌、骨、竹、树皮……捧古人契刻在手，见各式图形、文字，方恍然大悟——华夏历史何以错讹如此厉害！破解一二，如泄天机。即使朝闻道夕死，夜以继日，也只能逐一公之于世，率性而为，先斗胆嘲笑史学疑古一派的浑噩。

就余所知，目前民间拥有的文字根词的基数——远在殷墟甲骨文之上，从原始刻符、图画字到蝌蚪文（古文）、甲骨文、籀文，从单字六书到长篇碑铭，阴刻阳刻，左图右史，应有尽有。余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蜀玉文字系统应该是“殷墟”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也最具序列研究的可能。玉界曾有人倡导过“玉器时代”的说法，是否需要增设这样的时代名称，要审视其功用以及与历史契合的程度，玉石文字便是其中极重要的条件，遂与传统的文字史观多有齟齬，但正像阿诺德·汤因比所言：“对那些与事先设计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实，要予以特殊的注意。”（《历史研究》）蜀玉文字系统，就是这样一种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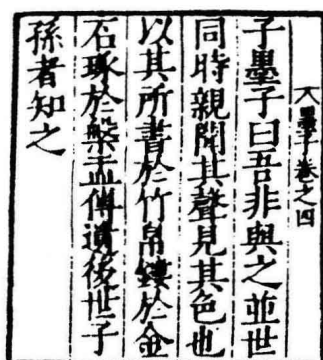
玉石器作为生产工具、巫筮礼仪用具和文字载体，肯定早于青铜，所以，套用西方人公元纪历和“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一类，填鸭子似要塞进祖宗的甲子纪年，便常常首尾难顾。有人还机械划分中国万年玉文化为三：一万年至四千年为巫玉阶段；夏、商、周至清代是王玉阶段；剩下的即民玉阶段，并引《越绝书》为据：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藏，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





笔者与彝族学者在工作室探讨三星堆与古彝文化的问题。



《墨子》卷四兼爱上第十四章书影。

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其实，这段话只就功能说了个大概，材料并非关键，而且，古人玉石不分，功能决定器型，像耜、斧、铲、铤、镰、针、凿、斤等，而非材料本身。古代本就有“美石为玉”的审美习性，三星堆玉石器这点十分突出。蜀玉实乃中国玉石文化巅峰，夏的特征明显，“巫”的成分更重，若袭用机械二分法便成问题。在世界的格局中——尤其是以西方话语权界定各种事物的格局中，我们当然想有个“玉时代”了，但落在何种时段，却很难判断，何况宗教、祭祀、天文、宗法、民俗、日常、艺术……与时俱进，“巫”与“王”就更难厘清。我倒以为“玉器时代”，或广义的玉石文化，最重要的考量范畴应在文字载体的问题上。许多人忘了，远古社会，从孤立的刻符到少量的铭文，从古籍中频频闪现的瑶牒、金简玉字、玉板、玉册、玉玺到短章长文，除陶符，都不免以玉石为先河。物俱在手，固敢言蜀玉文字系统迟早会解决语言史及国史诸种疑难。

用今人之观念比附古史或古物，最容易障目，且愚蠢，更何况百年意识形态化后的主观脑袋。比如传播，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现代人才懂得传播的时空问题，其实，这点古人也很清楚。墨子曰：

“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通过书写打破时空，传诸后世，对凝聚人类的经验是很大的诱惑。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必以玉石代结绳。三坟五典言及大道，在没有竹简和轻型材料之前不借玉石又凭什么？从古玺现有的材料看，起源很早，比许多印史描写得还早。老子已言及“为之符玺”，庄子也谈到“焚符破玺”。黄帝得龙图，中有玺章。汤王会诸侯，取玺置天子之坐。可见玉为文字载体在商就已流行。若谈及三星堆，更惊人的发现恐怕还是远在夏朝之前，玉石书契、玺章册页就已应有尽有了，与三星堆文化一期上限时间的公元前2870年更吻合，也或许更早。

三星堆玉石的出土与研究

三星堆玉石出土，一般都要追溯到1929年的燕道诚。其实，真

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焦虑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人，不光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不光有田野考察者，也有书上摸爬滚打一类，比如汤因比，他的论述——“各种风格正是文明历史所采取的各种动态形式的化身”，有助于我们在界定“玉石文化”时能提纲挈领；H. G. 韦尔斯在他被广泛阅读的《世界史纲》中，当涉及中国文明早期形态时，竟透彻地看出：“中国文明的渊源有南北两个……是南北文化冲突、混合、交流的产物，而南方文化似乎起源较早也更高一些。”蜀玉就传统图像史呈现的异质证明了这点。这领域也曾是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和许多学者接踵而至苦心经营的，比如卫聚贤、吕思勉等关于殷民族及吴越文化由江浙西迁的论述，张立志等关于黄帝、少昊、尧、舜均出山东之说，影响了不少人。现在看来，尤其三星堆甫出，便证明两种说法都搞错了方向，但至少还脱离了“中原说”另觅他途。关于夏族（吴越、淮隅之地的）起源东南迁徙中原，仅从器物看，实际上也只有三星堆文化能支撑韦尔斯的说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其《结构人类学》中也惊讶过北美洲和古代中国艺术的相似性，两者在以下六个方面表现出共同性来：浓重的刻意风格；以“裂分的形象”（split representation）表现躯体；从整体任意分割出细部，使其脱离原位；用两个侧面形象表现某一个体的正面；高度精密的对称性，但往往运用细部的不对称性，这些恰恰也正好关涉三星堆文化玉石雕塑的风格。

关注这块的还更应该包括东西方早期那些田野工作者，像瑞典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河南、甘肃发现了“仰韶文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R. Torii）、滨田耕作（Hamada）在东三省及内外蒙古考察，法国的桑志华（Emile Licent）、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通过在华北对“河套文化”的发掘，旧石器时代遂入国人视线。但他们似乎都在证明英国拉古别里（Terrien de Lacouperrie）的臆测，即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但当中国考古学者发掘出山东龙山城子崖、河南安阳殷墟的文化遗址，便使中国文化西来说难以成立。在华西地区寻找新旧石器的还有J·修斯顿·艾德加（J. Husto Edgar）、T·库克（T. Cook）、戴谦和（D. S. Dye）、C. L. 福斯特（C. L. Foster）、D. S. 巴特尔（D. S. Barter）的孩子们，戈登·鲍尔斯（Gordon Bowles）。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的李济及其同仁在安阳、二里头的发



燕道诚一家

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因为众多学者已看出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形态。故李济进而谈到：“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如何有一个问题是存在的，即在殷商时期的卜骨刻字出现以前，中国文字一定有个长期的演进过程。我认为重视这个长期的背景过程，就可能有新的路子”（《安阳》）。这些都可视为今天蜀玉文字系统研究的伏笔。

三星堆玉石出土很早，但数量之大，介入者之多，单是燕道诚1929年的意外发现，一坑就有四百余件。如此大量的玉石器出土，只有后来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能相提并论，出土玉器达七百五十余件，还有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出土玉器七百五十四件，然后就是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前者出土玉石器超过七百余件，后者达两千余件。最引人注意的是，“新干大洋洲”和“三星堆玉群”都是在传统的中原“王畿”以外的地区，而且都居长江流域。所以燕氏偶然发现的窖藏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当时的参与者，非常的民间性，包括剑桥哲学博士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便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戴氏在《四川古代遗迹和文物》中强调，长期以来成都地区出土石器被弃之如敝屣，所以燕氏的发现和器重便十分有益。而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发现这些石器和汉代的器物在某些风格上有“遗传关系”，主要指摇钱树，而那时还没有一棵三星堆文化的神树出土，但很快，半个世纪后这点就得到了证明。另外，通过这些石器，他还预感了中国文化和美洲玛雅文化意味深长的联系，两者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而这点后来又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那里得到了发挥，尤其是他的《面具之道》。现在则为更多的中外学者所关注。至于葛维汉的《广汉发掘简报》，其中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他提到根据当地的文献记载，至明代便每年都有玉石器出土；其次，断代上限新石器时代，下限周代初期，这是比较安特生和李济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再者，他定义了“广汉文化”。有步后者，再由《山海经·五藏山经》断“广汉文化”的时代为东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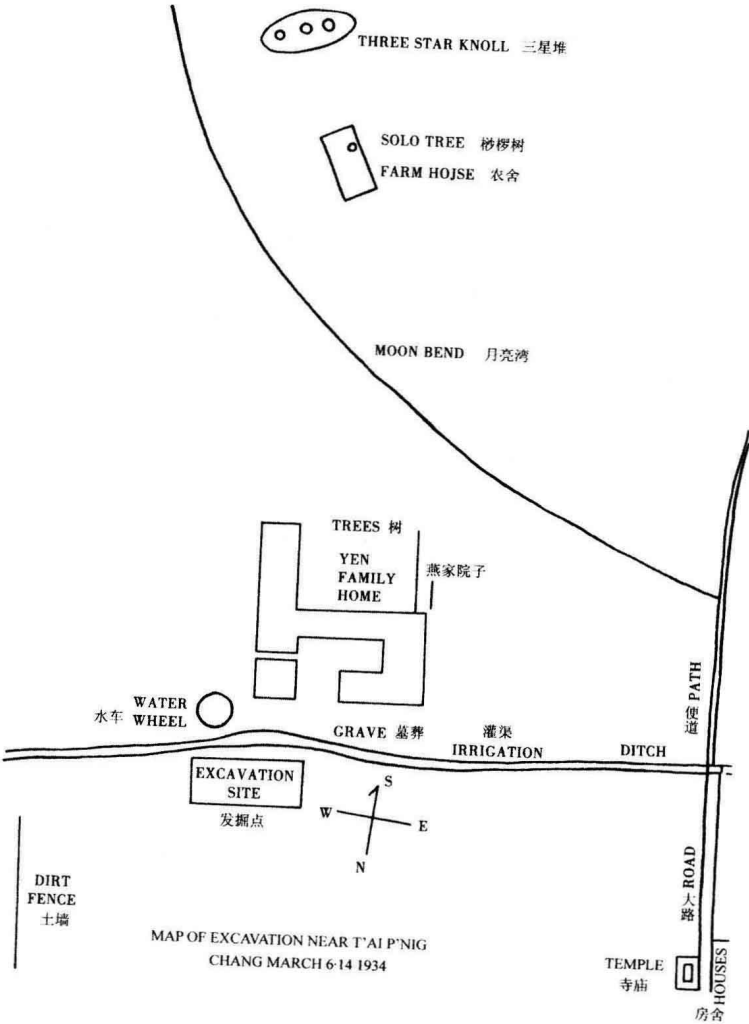
林铭均有《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除详陈当时琐事、器物与典籍的对照，却最早由圭涉及“黄帝之时，以玉为



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右一）和副馆长林名均（左一）在广汉发掘遗址时，与协助发掘的当地乡绅们的合影。

兵”之说，他直觉此发现有“无穷的希望”。通过他，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索要发掘时的照片和器物图形，以及戴谦和的文章，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直到现在，多数讨论三星堆文化的都在此范围，未得到真正的拓宽。

进入20世纪50年代，先后介入田野考察研究的有王家佑、冯汉骥、童恩正、敖天照、川大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等，随后是80年代初期的集体主义的发掘、命名，“三星堆文化”遂公之于世。冯氏最早预言“三星堆”为古蜀的中心都邑，1986年两个坑相继发现证明了这点——别忘了，发现者并非考古队，而是砖厂工人，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抢救性发掘”，随大量青铜器和玉石器的出土，尤



这是葛维汉等发掘时绘制的太平场发掘区示意图

其是世界上最高的青铜神像出土，三星堆文化才真正名扬天下。但对它的研究也随之越来越迷茫，与器物之辉煌不符。

依笔者陋见，阻碍其健康研究略有两大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其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前面说的“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发达文化先决论”，即使跳脱了前者，有李济、苏秉琦、张光直一流挡着，摆出“多元”的阵势，或看出古蜀文化或先史的存在，但话涉具细，也难脱窠臼。即使知道了三星堆都城遗址大于中原早商都城，与中商都城不相上下，这方面发达，那方面也蛮厉害，但都不敢言韦尔斯或卫聚贤所言，只好回到黄河长江文化并列、相互交流的老套路，或被动融入华夏的格局，如某某所言，言什么呢？言蜀文化固然有自身的渊源，自身的演变，在接受了长时期的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之后，才逐渐融回到全国的文化进程中去（李学勤语）。和钱穆的基调一致：“上古至先秦，华夏族为主干，而纳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听起来大致是对的，但一想想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由什么构成的，一细致到器物或符号的“此在”，便有生理上难挨的苦闷。海德格尔言，人们常说“人有他的环境（周围世界）”，但只要这个“有”仍未加规定，那么这句话在存在论上就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此在”本质上是以“在之中”的方式存在的。在之中，说穿了就是和物质或某种东西的操劳方式发生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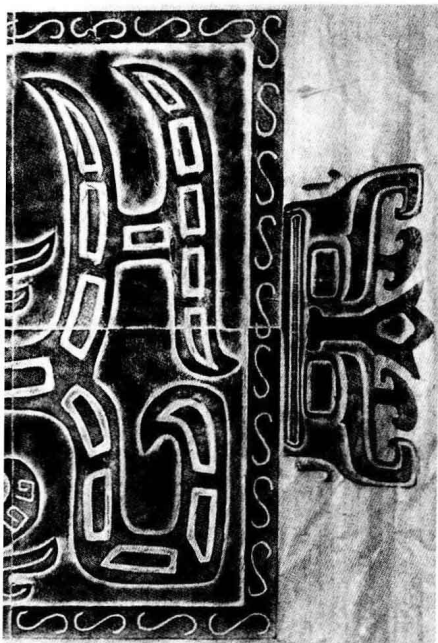
比如三代考古，发现牙璋出土仅四处：二里头、三星堆、郑州二里冈和陕西神木石峁，后两者不是科学出土，剩下的便只有二里头和三星堆了，如若后者具有更早的可能时，便马上会归入“未必本地制造”的论调。但跟三星堆大量象牙非本地所产的论调一样，最终有化石被证明为亚洲象齿板化石，说明亚洲象曾在成都平原生活过，象牙是本地产，非外来货。而且，蜀玉造像中也多有大象图案为据。由这点来看，前面所言较大城邦之富裕，当然就不会包括在较小城邦富裕之中。至于牙璋，比较一下安阳二里头的玉石器和三星堆玉石器（就按官方的时代推算，两个文化并存有四百年之久），风格、规模、造型之工艺、宗教之表达……那么很明显，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神人、鹰首出廓的牙璋，带着大量铭文的牙璋，甚至长达3米以上的边璋牙璋，三星堆文化的牙璋，也肯定不会包括在二里头那素得可怜的牙璋之中。

再看“妇好墓”出土的那尊著名的跽坐人，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只因其身后有不明之物，统称“宽柄器”。一旦西北齐家文化、三星堆文化出土有更完整的造像（见上古文化艺术馆所藏拼板浮雕图拓片），源流问题便昭然若揭，仅高7厘米的跽坐像便不至于影响2米多高的青铜神像和类似的玉石神像。工艺之退化也能粗分时序的先后。既然有巫玉、王玉之分，那么三星堆的巫玉显然就不包括在中原的王玉之中。所以多靠和田小件、司南刚卯、汉璧剑首、明清玉牌一类养眼的人，顿见气势磅礴的三星堆巫玉，便疾首蹙额，难以理解和认同。问题其实也很简单，既然能有260厘米的青铜立人像，怎么就不可能有高大的玉石立人像！

研究中还有种现象，是用后言论前事。比如据扬雄《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古蜀之“蛮”，但当玉石契刻文字纷呈，大量的青铜器摆在那里，最后也只能说在商文化影响下，蜀人可能有文字或礼乐。就笔者所见，三星堆古玉中就有表现弹五弦琴、或祭祖习礼的雕塑，金沙遗址出土有简陋的石磬，民间也有玉磬、编钟礼乐之属，图物俱在，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实际上，只要大量搜集散逸民间的玉石资料，就会发现，钟磬礼乐之享，浮沈禘礪（祭河川曰浮沈，大祭曰禘，风祭曰礪）之祀，在三星堆玉石构成的记号图式中，随处可见。更不消说远古的契刻文字，如若涉及此话题，其实也就觅到了关键所在。过去，虽偶尔也有匠气之人，所幸迈上了这道门槛，而一触及禹迹的问题，——说穿了也就是“夏朝文字”这一根本问题，便倒吸凉气，深怕越了中原，赶紧缩回传统的“古”来，仓颉造字、禹生石纽、娶于涂山、会诸侯于会稽、岷嶲碑文……诸如此类的“夷”事，又全都断给了“华”。那一破五千年文明的契机固然又会陷入“开国何茫然”的境地。

关于文字，扬雄所谓“不晓”显然是“后言”，三星堆为何时之物？扬雄为何时之人，扬雄距夏更近，还是孔子距夏更近？显然是夫子。但就连孔子也曾感慨言夏、殷资料不足：“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矣。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夏不过二代便已模糊，何况扬雄，更何况今日。再者，扬雄所言不识字的蜀人，究竟是个范畴的“蜀人”，这也是个未知数。即使甲骨文中不时出现的“伐蜀”之“蜀”，现在也有学人认为非今日四川之“蜀”。舆地





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所藏三星堆文化浮雕玉板画拓片。

名字上的混淆，恐怕是史学中的高难，三星堆研究一般在此问题上最难翻越。如著名的班簠（毛伯彝）中的“秉𩇛（繁）蜀巢令”，其繁，其蜀，其巢，在学界都争论得十分厉害，尤其是“巢”，又涉及商汤王灭夏放桀于南巢事，这“巢”究竟在安徽的巢湖，还是在蜀，事关重大，更不消说，三皇五帝的地望。即使禹划九州，梁的分野，都事涉三星堆的解读，古史谜案的破释，但都需器物，如三星堆文化区域发现的玉石舆地川流图，玉石、龟甲、树皮上的契刻图文，一旦吾等释读公布，定将带来古史研究的一线曙光。由此可见，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实物。两者演绎出考古所谓的双重论据法。所以，金石学之兴起，就在于包含两者，类似考古学。宋代尤盛，故王国维言：“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虽现在看来，也问题多多，但毕竟呈现出器物的重要性来，下面趣谈引以为证。

有人参加中原华祖祭典，畅言黄帝的发明，文字、舟船、车马、弓矢、指南……然后又“懵”了个足球，也就是蹴鞠，遂遭起哄。其实他并没“懵”错，但如若只依钱穆《黄帝》一书，自然无以辩驳。若参读孙作云先生的《蚩尤考》，便一清二白。蹴鞠即今日踢球。鞠，蹋鞠，以革为圆囊，实以毛，蹴蹋为戏。球旧曰丸，叫鞠丸。鞠戏为黄帝所造，是战胜蚩尤的乐舞，与周朝大武舞相同。“所蹴之鞠（巨六反）即蚩尤之头也。熊族战胜蛇族后，斩蛇族酋长之头以足蹴之……其后以人首易碎，乃以革为头形，中实以毛，以代蚩尤之首。”（《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蚩尤为南方以蛇为图腾的部落战神，苗裔，“之后即为三代之夏”……这样，也就牵涉到鲧禹的问题，牵涉到黄帝蚩尤之战之本事——也恐怕就是北方语系和南方语系冲突下的“华夷”问题。碰巧又和三星堆玉石文化相关。因前不久，我恰好就看到三星堆玉石雕塑中有表现蹴鞠的。古之踢球并非现代的运动，而是生死门，玛雅文化也有，牵一而百发，可见器物之重要。

不啻在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上，在已成往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上，都有这方面不同程度的缺失。商、周为西方人承认，因为有甲骨卜辞，口吻和阿诺德·汤因比如出一辙：“夏代是传说的朝代；商、周政权是真实的存在，它们的历史性得到幸存下来的物质文化遗骸证明，包括诸如商代刻写在‘卜骨’上的铭文之类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同代文字史料。”（《历史研究》）其实这些也不过

是笼统的晚商之史，从𣪠、契到汤武，尚有十四代是没见着的，而夏朝就更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西方人很难认同。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中原，但在偃师二里头遗址，除假设的“夏商分界”、“西亳”、“夏都”，包括龙山、新砦，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这种“押宝”究竟有多少成分属“断夷予华”无意识犯的错误，不得而知，反正，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由此看来，许多问题都是观念引出的毛病。所以，这样一来，国家也好、民间也罢，凡关注华夏五千年历史确证者，便又都被推到了历史的边缘或交汇点上——那就是夏朝的文字，文字就牵扯到文字的载体，也就是器物。器物在古代可谓广义的图画，所以，宋人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三星堆玉石三者皆具。

正因为推演五千年文明，必历夏朝，所以，大家的目光也就都慢慢地集中到了夏朝的文字，备受关注的三星堆字学与图识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无怪乎，有权威断言，若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来求解。或许其人早已耳闻目睹蜀地出现的古文字，做过些研究。如若三星堆玉石大量的器物 and 文字一旦展现，必让人愈加明显地感到，李济在文字演变过程中建议关注的“背景过程”，弄不好，恰恰就是要由三星堆的文字系统来呈现，“新路”可能就在这里。可惜，这点又一如既往地肇始民间，但想想发现安阳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喟叹。

三星堆玉石器的民间收藏与研究

从燕氏发现三星堆玉石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四百件，除十来件归华西大学博物馆，其余均流布民间。解放后王家祐还说服燕道诚儿子捐出一批玉石器，数量不详，也不知是否属四百件。反正散落异地和国外的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一件玉神人面，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墨玉质的捆绑俑，20世纪30年代为爱德华·索南夏因所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有

